

编者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华侨华人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与管道,同时也是新世纪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人。那么,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展如何?华侨华人研究面临着哪些问题?他们对中国外交有什么作用和影响?这一群体对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有何影响?另外,华侨华人研究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有着何种联系?为此,本刊特约记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赵思洋就上述议题专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张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东盟问题、跨国移民及华侨华人等,著有《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为什么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等。

华侨华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

——张振江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赵思洋(以下简称“赵”):您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基本情况?

张振江(以下简称“张”):华侨华人是中国一个独有的现象,尽管世界各国

各民族都有走向国外的移民,但由于绝对数量庞大、地理分布广泛^①、移民历史悠久、研究基础雄厚,结合华侨华人在近代中国国家发展过程的重要与独特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重视及其相应的侨务政策等,使得作为一个群体的华侨华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所以,尽管不是教育部学科名录中认定的一个学科,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指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肇基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受挫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复兴于改革开放以后”。他特别提到在 1930 年代以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为代表的中国华侨研究“大概与国内学科进展同步或略有超出,与国际同行相比也不遑多让”。^② 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把新中国以来的华侨华人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即“封闭和停滞时期”“黑暗或空白时期”“复苏和启动时期”“改革开放和繁荣时期”。^③ 参考这两位学者的分法,我认为,可以把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概分三个阶段:建国至 1970 年代末的“冷战对抗的封闭停滞期”、1980 年代初到 20 世纪末的“改革开放的启动复苏期”、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崛起的繁荣发展期”。

“冷战对抗的封闭停滞期”是在国际上两大阵营对抗及其对中国国内影响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侨务政策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由于相关机构的关闭和人员解散,原本在 1950 年代已经出现的华侨华人研究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改革开放的启动复苏期”也是从机构开始,几个标志性的机构包括侨办下属的华侨大学 1980 年设立华侨史研究室(后改为华侨华人研究所)、暨南大学 1981 年成立华侨研究所(后改为华侨华人研究所)、1981 年全国侨联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社科院 1983 年成立华侨研究所,以及 1984 年全国侨联成立的华侨历史研究所,等等。伴随着这些机构的成立,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资源得以整合、队伍慢慢形成,相关成果也开始出现。1986 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创办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同年,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也创办《八桂侨史》(后改为《八桂侨刊》),这两本杂志至今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 1999 年成立华侨华人研究中心;2000 年暨南大学

^① 在 2014 年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组织的由中国人大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网、中国经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广播网、光明网、法制网和中国日报网等 12 家网站联合举办主题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同圆共享中国梦”的网络采访中,国务院侨办裘援平主任表示“据最新统计,现在海外华人华侨有 6000 多万人,分布在世界 198 个国家和地区”。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03/07/content_1841779.htm,2016-09-25。

^② 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 年第 1 期。

^③ 周南京:《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六十年感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华侨华人研究院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国内高校中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最重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15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正式走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和学术机构,这标志着华侨华人研究进入“中国崛起的繁荣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高校、各级社科院以及各级侨务部门牵头和组织的专门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多达30个、相关人员达400—500人。国内有专门的华侨华人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各种主题的华侨华人研究丛书不计其数,在中国知网上以“全文”为检索类别、以“华侨华人”为检索词的检索结果,从2001—2016发表的相关研究多达8.6559万条。尽管检索结果有一些重复和不准确,但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华侨华人研究成果逐年稳定增长;二是华侨华人研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①

庄国土教授曾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呈现的五个特点,即“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的趋势”“继续重视原始档案文献整理和大型工具书编辑”“重视微观研究与实证资料的获得”“国际化程度有所提升”和“学理性研究与国家政策咨询的结合”。^②现在看来,华侨华人研究依然如此并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譬如,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的态势,也正是因为华侨华人研究不是教育部学科名录中认定的一个学科,它反而没有学科的限制和羁绊,也没有为坚守和捍卫学科的压力。这契合了学术界近年来致力于打破学科藩篱、鼓励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问题的努力和潮流。但也要看到,没有学科呵护的当代华侨华人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散乱态势,诸如不少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会议议题显得不够集中,参会人员专业背景比较庞杂,譬如依托在政治学的多从事侨务政策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附属于经济学的多注重华商和华人经济研究,在历史学之下的多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归口在文学的多从事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而划归在语言教育类的则多从事华文教育的研究和教学。多元的交流当然有意义,但从学科建设和会议成效方面来看,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

尽管如此,中国崛起和中国国际化日益加深的大背景决定了华侨华人是个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问题和领域。有学者做过专门统计,国家社科基金在

^① 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24日。

^② 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

1991—2013 年期间设立了 92 项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其中 1991 年仅有 1 项,但之后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到 2013 年已达 12 项,其中“八五”规划时期 6 项、“九五”时期 10 项、“十五”时期 18 项、“十一五”时期 23 项、而“十二五”前三年就已经有 35 项。^① 此外,各个地方都在根据自己的特色确立不同的研究主题与旨趣。除了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暨南大学、国务院侨办、侨联每年都设立专门的招标课题,支持和鼓励学术界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移民重要省份的上海、浙江、江苏等都涌现出了一批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新兴机构,它们积极组织和策划华侨华人、海外华人、新移民等学术会议与活动,为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平台,让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聚在一起,观点交锋、思想磨砺,使华侨华人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

简单来讲,仅仅作为一个话题非“学科”的华侨华人研究在这 30 多年的发展的确令人欣喜,这既是由于华侨华人本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是与相关学者的坚持和努力分不开的。

赵:不仅中国学者在进行华侨华人研究,外国学者对此也很重视,并且形成了关于这一议题的跨国学术网络。您可否介绍一下外国的研究状况,他们的研究与中国学术界有何不同?

张: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存在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在人数、规模、范围和影响等越来越大,所以,海外华人也愈发成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议题。举个代表性的例子,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长期从事中国清史研究,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著作。^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转向了海外华人的研究,并在 2008 出版了他平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③以大历史和大叙事的手笔将走向世界的中国移民史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潮中,明确指出海外华人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华侨华人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国际学术界,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很多是华裔学者,资深的老一辈学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美

^① 路阳:《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看华侨华人研究发展状况》,《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孔飞力的系列著作,〔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9 年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③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王灵智、马来西亚的陈志明、新加坡的廖建裕等等,中青年学者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刘宏、周敏,牛津大学的项飚、加拿大的郭世宝等等,他们均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有着系统的研究和高质量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学术界还有不少专门的学术组织。这里只介绍两个影响较大的,一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简称ISSCO),该学会正式成立于1995年,但从1992年就开始赞助和组织世界各地的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活动,现在每两年组织一次全球范围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最近的第九届大会是2016年7月6—9日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召开的,参会者多达三四百人。另一个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The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该学会最早由美国俄亥俄大学发起,会员主要是从事海外华人与文献收藏的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团体、高校系所、博物馆、档案馆及学者等,其宗旨是为海外华人研究提供学术交流、资源分享和探讨合作。目前已经召开过六次学术会议,分别是2000年在美国俄亥俄大学、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9年在中国暨南大学、2012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第六届是2015年10月由华侨大学、厦门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在中国厦门举办。

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较为稳定的华侨华人研究力量。根据台湾中华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会长、台北市立大学徐荣崇教授提供的信息,目前台湾的海外华人研究主要有“中华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和“海外华人研究团队”两个学术组织。“中华海外华人研究学会”成立于1989年7月,他们搜集有关海外华人资料、联系海外华人组织、相关学术团体及专家学者等,出版会讯、学报、丛书,翻译有关论著、举办及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学会主要出版《海外华人研究》期刊,自第九期开始,该期刊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合作进行国际性发行。“海外华人研究团队”成立于2008年,由徐荣崇教授与台湾师范大学王秀惠教授共同发起。他们集结学者、组织会议,其中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是每年为台湾的高校研究生组织“海外华人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鼓励并指导年轻学子积极投入华侨华人研究。目前,该年度会议已经先后在台北、香港、广州、吉隆坡、金门、厦门、台北和澳门举办。此外,近年来,台湾的侨务委员会还在台湾相关大学成立了专门的侨务研究中心,分别是空中大学的华人远距侨教研究中心、金门大学的金门侨务研究中心、台北市立大学的东协(大陆称为“东盟”)侨务研究中心、文藻外语大学的越南侨务研究中心、台东大学的韩国

侨务研究中心和暨南国际大学的侨务研究中心。

至于中外研究的不同,很难一概而论。由于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关注点不一样,所以研究主题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等领域,当然也不排除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一些海外华人学者,由于个人的身份和经历,他们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简言之,研究华侨华人,如何超越华人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利益导向,把华侨华人群体的所思所想和所需放到第一位,是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赵:您能否介绍一下新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进展?

张:随着中国的崛起,华侨华人作为一种现象越来越凸显,所以围绕这一新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也有了新发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地理范围扩大。从地理范围上,华侨华人从最为集中的东南亚,以及具有移民吸引力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移民国家逐步拓展到欧洲、非洲、拉美等地;特别是一些传统研究不怎么重视的小国的华侨华人情况也得到了挖掘。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新西兰的华侨华人研究,并产出不少研究成果。暨南大学推出的“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包括不少拉美地区的华侨华人研究,其中高伟浓的《委内瑞拉华侨史略》,以及他目前正在从事的对多米尼加及荷属加勒比地区的华侨史研究,可以说是国内也是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的拓荒者。^①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还出现一个非洲华人/中国非洲人的国际研究网络(Chinese in Africa/Africans in China,简称CA/AC),会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数百人,已经召开了三次专门的学术会议,前两次是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第三次会议由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主办,规模近百人,我自己还被选入它的组委会。另外,该研究网络发起人之一的黄石秀(Tony Tu Huynh)博士目前已经任职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院。非洲华人/中国非洲人国际研究网络的第四次大会2016年8月底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行,按照组委会专门会议计划,未来还会组织更多的学术活动。

第二,研究对象更加丰富。从海外华人构成上,从传统的只注重侨领、高科技群体和重要人物与人群的研究到对“老少边穷”对象的关注,譬如,不少研究开始关注最基层的移民、非常规类移民、女性甚至是老人群体。特别值得一

^① 高伟浓:《委内瑞拉华侨史略》,新加坡:学林书局2011年版;高伟浓:《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袁艳:《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提的是,近年来出现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议题格外引人注目,也就是说,海外华人不仅仅是汉族的华人,也包括海外维吾尔族中国人、海外藏族中国人、海外苗族中国人、海外回族中国人,等等,尽管在具体的名称提法上还有待商榷,但这种探索的确值得鼓励,而且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甚至西方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①另外,“新移民”逐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伴随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有经商的、有求学的、有移民的、有企业外派的,他们的身份不同于传统的华侨华人,被简称为“新移民”。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华侨研究”“华侨华人研究”“海外华人研究”“中国新移民研究”等不同名称的变化。

第三,研究方法更加多样。从研究方法上讲,华侨华人研究从之前的人文学科(历史和文学)一家独大,到现在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等学科参与,这对华侨华人研究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此外,随着信息时代学术资讯的便捷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大陆学者有了更多走出国门深入华侨华人群体进行实地调研的机会,也与海外学者和学术团体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与交流,因而在议题选择、方法论等方面都有了一定国际化的进展。也正是有了其他学科的加入,华侨华人研究才带有更多的比较视野和国际视野。比如,孔飞力关于要把海外移民与中国国内移民结合起来、要把中国的海外移民史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相结合的呼吁,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此外,前面提到的把非洲华人与中国的非洲人进行一定的比较,把海外华人与海外印度人、海外犹太人等群体相比较,都有助于对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定性与认识。

赵:您认为在研究过程中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张:华人华侨研究尽管有一些新发展,但整体而言,华侨华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多年前就曾指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存在着急功近利、低水平重复、创新能力不够、一手材料掌握不足等问题,显然,很多问题都是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问题,但因为没有学科竞争压力和监督,这些问题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更为突出。也正是因为学科多元化,以及我本人学科训练和知识所限,很难全景式地客观罗列出华侨华人研究的问题。就我个人

^① Elena Barabantseva, "Who Ar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China's Search for Transnational Ethnic Unity," *Modern China*, Vol. 38, No. 1, 2012, pp. 78-109; Elena Barabantseva,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 Routledge, 2010; 张振江:《为什么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南方华侨华人杂志》2014—2015年第7卷,第10-14页,参见网址 https://chl-old.anu.edu.au/sites/csds/csds_toc2014—2015.php, 2016-09-10。

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学科问题。前面谈及过,华侨华人研究不是一个教育部学科目录中认定的学科,因此,就很难获得像其他学科一样的资源,诸如建立学院、招聘教授、培养学生,甚至是设立课题等。这极大地限制了研究人员对华侨华人的研究选择和研究兴趣。相对其他学科,全国范围内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规模和人员机构,尽管这些年有了新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讲还是很有限。实际上,由于目前大学的建制都是以学科为导向的,没用统一学科归属的华侨华人研究因而在不同的大学会附属或依托在不同的学科。以拥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院的暨南大学为例,之前的华侨华人研究基本归属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的学科,所以研究内容也多为中国外交史、专门史以及侨乡研究等。后来暨南大学进行机构调整,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学科定位为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学),所以华侨华人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现状、政策及国际问题研究等。其他相关机构同样都存在与学科的关系问题。因为各个学科都有各自一套共同接受和确定的内容、理论和方法,所以华侨华人在各个学科中都属于一个比较边缘的研究议题。正因为这样,十多年前,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很多华侨华人研究的权威学者都站出来论证和呼吁建立中国的“华侨华人学”,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需要注意的是,在包括教育部“双一流”和各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等新一轮高等教育强化学科建设的形势下,华侨华人存在着新的被边缘化的危险。就此而言,尽管华侨华人问题越来越重要,研究队伍在扩大,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目前,暨南大学正在联合国国务院侨办准备成立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会(目前有一个中国华侨历史研究会),希望这样一个一级学会的成立有助于整合研究资源。

第二,比较研究方法问题。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不足导致了研究理论高度不够。丰富和完善比较研究方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国内外比较。诸如孔飞力所呼吁的把海外移民和国内移民进行比较,从而探寻中国移民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二是地区比较。比较不同地区的华侨华人,东南亚、北美、欧洲、非洲、拉美的华侨华人当然不同,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不同而忽视可能的比较,就很难产生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提炼;三是国际比较,譬如把每一特定地区和时段的华人与其他移民团体进行比较,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才能归纳出华侨华人作为跨国移民群体之一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否则,诸如对华人“叶落归根”“爱乡爱国”等情结的一味强调或突出就显得有些自话自说。

了。理论的产生一定得有比较的视野,因为缺乏应有的比较,所以,整体而言,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强调的是,一定得把华侨华人研究放置于跨国移民的大背景中去进行比较和研究。

第三,学术研究和政策宣传问题。根据北京大学梁英明教授的分析,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研究复苏的基本动力在于纠正文革时期对海外华人的极左政策,“除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肆意歪曲和破坏党的侨务政策以外,许多干部和群众也不十分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特别是不了解华侨华人对祖(籍)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因此,有必要在社会上开展‘扫盲’工作,即所谓扫除‘侨盲’,让更多的人了解华侨华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现在看来,“仍停留在肯定老一代华侨的爱国奉献精神及落实侨务政策上”依然是目前很多华侨华人研究的基础,这一点对“推动华侨华人的学术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政府政策需要越来越多的学术和智力支持,智库建设成为学术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持和需求导向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和机会,各种科研项目设立,以及新机构纷纷挂牌成立,像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华侨华人研究也呈现出一幅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政府的需求引导塑造(客观上也局限)了华侨华人的研究议题。诸如,更多“老少边穷”的研究议题、一些现阶段未显重要和紧迫的议题、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当下政策宣传基调的议题,等等,华人华侨研究领域被学者深耕精作的空间也越来越少。缺乏多元议题和多元观点的学术研究很危险:一方面,学术研究的结论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和同质;另一方面,如果有国际突发事件,政府从学术界寻找智力支持的选项也会越来越少。这种现象对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影响更为显著。^①

二、华侨华人与中国对外关系

赵:您如何看待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张:随着经济力量的持续上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影响也越来越大,原因不仅在于强大的国家能力、持续的经济增长、积极有为的外交等等,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到了海外,他们的勤奋、聪慧和

^① 梁英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竞争力让世界切实地看到和感受到中国和中国人，因为只有一个个鲜活的中国人才给世界一个感性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来源于媒体的宣传、政府的援助，但更具体、更直接、更感性的认知则是来源于对见到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印象。

回顾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和西方社会相互联系的历史，而其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难怪孔飞力教授在晚年发生学术转向，提出不了解中国海外移民史就不能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国际化不仅是中国商品的国际化，更是中国人的国际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人的认知与接受。举个例子，根据美国的人口统计，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移民是2000—2010年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他们才是中美关系中最持久和最有韧性的成分。

实际上，从晚清以来，无论是资金、人力和思想，华侨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孙中山“华侨乃革命之母”的名言就是这种写照。另一个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一直是中国的最大投资方。以至于学术界不少学者专门研究“华人经济”，这也是世界经济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从这个角度来，中国的国际化过程，就是华人不断走出国门，让外界认识、了解和接受中国与中国人的过程，也是海外华人不断把外国的资本、管理、技术及理念等带进中国的过程。在这种中国不断国际化和被国际化的进程中，海外华人都承担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关系也面临着转型。您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张：中国外交转型的背景有两个：一是普遍意义上的背景，即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各国外交都面临新挑战和机遇。普通民众在外交中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既是外交的目的（“外交为民”的说法就是代表），也越来越成为外交的中介和手段。另一个背景则是中国的特殊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上述这两种背景都需要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转型。这两种背景都需要突出个体在国家外交中的中心地位，所以才有诸如“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就此而言，华侨华人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与作用不言而喻。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数据，目前，海外华

侨华人已超过6000万人,分布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生活在中国各地。在这一庞大群体中,各类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才达400多万,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各种华侨华人社团逾2.5万个,全球华文学校近2万家,数百万学生在校接受华文教育,海外华文学校教师达数十万。^①

华侨华人这一庞大的群体既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内容,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方式,他们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首先,他们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其次,因为海外华人对中国和居住国都比较了解,所以他们是中国与所在国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很多时候他们是中国外交(实际上也是当地国对中国外交)的有效协调人,协助中国也协助当地国更好地沟通,有效地解决问题。譬如,几年前中国“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袭击,因为涉及多国政府、军方甚至毒枭等多种力量,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在处理时都感到棘手,结果是当地华人在处理惨案时发挥了巨大的协调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华侨还是华人,他们其实也都是中国外交的服务对象,也更应该是中国崛起的受益人。中国的崛起直接受益者的首先是中国公民,包括海外的中国公民,然后是广大的海外华人,凭借他们具有对中国和居住国都很了解的优势,可以从中与当地国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中获得利益,中国侨务政策中“以侨为桥”正是体现了华侨华人的这种独特角色。

中国崛起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终将裨益世界各国人民。目前,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设想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华侨华人的地位与作用显而易见,同时这也是一个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华侨华人、跨国移民与国际关系

赵: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跨国移民研究似乎是一个相对边缘的研究议题?

张:是的,尽管华侨华人很重要,但在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却不是一个主流

^① 《“一带一路”连接海外华侨华人:访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泰国商业部前高官谢捷魁等》,http://sscp.cssn.cn/zdtj/201503/t20150309_1537519.html,2016-09-25。

话题。对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跨国移民也是个比较边缘的话题,因为它在内容上与安全、外交、政治领袖等“高政治”的话题相去甚远,甚至和经济、环境等热门的非传统议题也有一定距离;在方法论上,跨国移民与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更是大相径庭,传统国际关系是以国家为基本的和最小的研究单位,尽管跨国移民也是个群体概念,但更多时候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就此而言,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跨国移民都不在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之内。

赵:那您如何看待华侨华人与跨国移民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前景?

张:正如一枚硬币两面,边缘话题当然是挑战,但反过来这也恰恰是跨国移民议题对国际关系未来发展与研究的价值所在。一是因为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口跨国流动的便利,使得跨国移民成为一个显著的国际现象,近年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数量和频率的不断刷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之前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那主要是限于海洋交通的条件,但目前看来已经是“有阳光和空气的地方就有华人”了。二是由于诸如欧洲国际难民事件,以及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在移民政策上可能的变化,凸显了人口跨国流动对于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可以断言,随着跨国移民现象的凸显,跨国移民研究将会迎来春天。

当然,就理解和解决跨国移民这个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努力与协作。国际关系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谈到的“边缘性”的问题,我觉得两者的连接将会产生双赢局面:一方面,跨国移民(我更喜欢用“跨国流动人口”)会大大丰富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会在内容的重要性清单上逐步上升,甚至有可能会一度成为一个“主流”的话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视角也将大大裨益对跨国移民的理解。譬如,作为世界上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最大机构之一的国际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 ISA)就专门下设了族群、国族主义和移民分组(The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Section, ENMISA),而且近年来有较为频繁的学术活动,表明移民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话题。成立于 1951 年、旨在协助确保有序和人道地管理和帮助国际移民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最近被正式批准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移民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新图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达成更密切的法律和工作关系。他相信,被

联合国大会批准的《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决议草案将有助于全球更有效应对突发的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正式通过决议批准中国加入该组织。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马朝旭所述,中国目前正从移民来源国向移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等多重角色转变。^①这表明,随着海外华人及来华外国人越来越多的跨境流动,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移民合作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的一个研究主题就是海外华人,该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5》列为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0位、中国智库排行榜第七位。^②

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研究不乏精耕细作,但跨国移民研究却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就中国学术界而言,一定要把华侨华人研究纳入跨国移民研究的大背景与整体框架中来,这不仅是华侨华人研究未来理论生成的重要前提,也是能够融入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成为国际关系主流话题的必要条件。

^① 新华网:《国际移民组织举行特别理事会批准中国加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6/30/c_1119143571.htm,2016-09-24。

^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网站,<http://www.ccg.org.cn/>,2016-09-24。